



現代之偉大性

李石岑

1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偉大性。一個時代之偉大性之促成，有許多前因後果。一個新時代之開闢，固然有些是突變的，飛躍的，但不能忽視牠的前因與後果，這便是說不能忽視牠的客觀的條件。十三四世紀的文藝復興，十五六世紀的宗教改革，十七八世紀的英法革命，都有牠們的前因後果，都有牠們的客觀的條件。一個時勢之造成，決不是無中生有，決不是出於某個人一朝一夕之勞與一手一足之烈。一個時勢之造成，是客觀的條件逼住着，圍繞着，使你前無去路，後無來路，結果不能不走上新時代開闢之一途。所以我們處在一個時代，必先認識那個時代之客觀的條件，然後能認識那個時代之偉大性。現

時代之客觀的條件，是從工業革命後所發生的貧富懸隔，因此產生了許多的世界險象；而思想學術遂由是發生一種劇烈的變化，因以蔚成現代之偉大性。現代之客觀的條件既已認識明白，則現代之偉大性自不難於分解。

二

現代乃是一個由理想而進到現實的時代。一般理想主義者所倡導的人類主義，到現代都失了權威。因為他們的人類主義，只不過寫在紙上玩玩，鬬論理學上修辭學上的戲法，供文人哲人的欣賞，實際與我們具有肉體的人類並不發生何種關係。真正的人類主義是要使人人能夠贍衣足食，使人人能夠不飢不寒，而不是專做些搬弄名詞的工夫，也不在喊着一些粉飾耳目的口號。我們知道自從培根倡導「人國」以後，人類主義、人道主義的聲浪遂繼長而增高。降至孔德，而有所謂「人道教」；繼至功利論者，而有所謂「謀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他們的理論未嘗沒有片面的理由，然而與廣大的人類固

絕無關係。他們不過提出一個「人道」的口號，提出一個「最大多數」的口號，結果所謂「人道」不過是少數者的「人道」，所謂「最大多數」不過是少數者之「最大多數」而已。更進而至最近的實用主義者，他們覺得實證論者、功利論者的思想還不徹底，於是大揭其人本主義的旗幟，如英國的失勒是其最著者。然而實用主義者不過增加一些唯心的色彩、淑世的色彩，比實證論者、功利論者並沒有甚麼不同。他們同樣的不能達到現實的一步，同樣的不能使人類達到最低限度的要求，所謂不寒不飢。實言之，他們是同樣的玩的論理學上修辭學上的把戲。不過他們倡導人類主義的思想對概念世界而發，比培根所倡導的人類主義對天國而發者略見進步而已。史迪訥（M. Stirner）真說得好，他說：「凡所謂善，所謂神，所謂人類、自由、正義、人道等等，都只是幽靈（Geist）的化身。」你看，培根所說的「人國」，孔德所說的「人道」，功利論者所說的「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實用主義者所提出的「人本主義」，那一種不只是一個觀念，那一種不只是一個幽靈。進一步說，史迪訥否認一切的一切，而特別提出一個「自我」，然而「自我」

又何嘗不是幽靈之一種。現在這些花樣翻新的說法都不能使人發生信仰。能夠使人發生信仰的，唯一的要件，是在拿住現實。是在拯救人類切身的痛苦。這是現代思想界的一個轉變。

並不止於思想界之由理想性趨向現實性，乃在使整個的思想界立刻成爲現實界，這是現代所以成其爲偉大之處。十八世紀之末和十九世紀之初，可謂玄學極盛時期，然而玄學不足以拯救人類切身的痛苦，這是無須說明的。十九世紀之末至二十世紀之初，可謂科學極盛時期，然而科學發達的結果，不僅不足以拯救人類的痛苦，抑且使人類的痛苦愈益加劇，這也有客觀的事實可證。所以到了現在，都認爲思想界自身須加一番改造，思想之切於現實生活而又能拯救人類切身的痛苦者，方有存在之價值。於是思想界莫不轉向到現實界。還有一點，現代的思想界自身失其立場，思想界須以現實界之立場爲立場。思想不足以左右羣衆，思想須立足於某種現實，方足以左右羣衆。思想成爲某種現實之說明的工具，除作工具以外，別無其他能力。這也是現代一個特徵。這是我們處在

現代應該認識的第一點。

三

現代又是一個由精神進到物質的時代。一部哲學史，真正的建立一種精神主義者不過三數人，其餘都是用物質做補充，用後說以補充前說之不足；或則所持的皆爲乾脆的物質主義。柏拉圖是精神主義最早的建立者。他的理念說除促進有神論的思想以外，曾發生甚麼功效？他的弟子亞里斯多德就比他聰明多了，趕快用物質去修正他的精神主義。所以柏拉圖提倡理念說，謂理念與個物全然分離，亞里斯多德便謂實體即內存於個物之中，且用實體去替代理念，這比柏拉圖強得遠了。康德是精神主義的第二個建立者，他的「物如」說、普通概念說，除增加一些論理上之矛盾以外，又有甚麼特色？他的私淑者黑格爾又比他聰明多了，趕快用物質去修正他的精神主義。所以康德主張有普遍概念，黑格爾便謂普遍概念即存於個物之中，而且是繼續發展的。這又比康德強得遠了。

除此而外，哲學上的巨頭都是些物質主義者。而且同時是無神論者。希臘哲學的開祖達雷士便是物質主義者，同時又是無神論者。自從達雷士直到德謨克里特士，幾乎佔了希臘哲學的全部，試問那一個不是物質主義者。再觀察近代，最聳人聽聞的是唯物論之世紀的展開：十七世紀之英國的唯物運動，十八世紀之法國的唯物運動，與十九世紀之德國的唯物運動，都在近代哲學史上佔了一個確定的位置。即此可以觀察人類思想的進程。若在現代，則物質主義更以特殊的形式而發展。現代的物質主義者認以前的物質主義皆脫不了形上學的謬誤與機械論的癥結。現代的物質主義者認物質是自然的過程，也便是歷史的過程。嚴格的說，現代的物質主義者已經脫了哲學的領域，而走入實踐的領域。因為如果認物質主義屬於哲學的領域，則物質主義仍屬精神活動之範圍以內，這在現代的物質主義者是絕對的不甘受的。在此點說來，現代的物質主義者正要提出這樣一個口號，便是「將來無哲學。」這又是現代思想界一個轉變。

精神和物質那種先發生呢？這可以說是不成問題的問題。現在請從個人說起。個人

的精神不是附麗在身體上面嗎？試問離了身體還有甚麼精神在那裏？這是一種淺而易見的事實。再講到世界，我們知道世界經過很長久的時間演化之後，才有地球，才有動物，才有人類，才有人類的精神，試問精神在先，還是物質在先？如果不是患有玄學癖的青年，恐怕不見得肯輕意迷了自己的方向吧！如果這點能夠辨別，那末，對於連帶發生的自由論與決定論，也就容易確定自己的立場。自由論與決定論本是倫理思想史上一個老問題，但這個老問題在現代卻得了一個新解決。人類任如何的倡導自由意志，但人類能逃出時間與空間的兩重鐵鎖麼？然則所謂自由意志，乃是在時間空間的兩重鐵鎖之內談自由意志，那就所謂自由意志也就很有限很有限的了。質直的說，所謂自由，也就不過是在極小的範圍內一種選擇的自由。譬如坐在食桌旁可以由你自由選擇食品，但你絕對不能放棄食品而不食。現代的自由意志論不過是坐在食桌旁自由選擇食品之類，這不是一種很可憐的自由意志論麼？在明眼人就必先想方法要如何去取得食品。

精神和物質是青年性和老年性一個對照。在血氣旺盛的青年，必滿貯着動物性，當

然是走的物質、欲望、衝動等一條路子；在血脈枯竭的老人，必滿貯着所謂靈性、神性，當然是走的精神、靈魂、意識等一條路子。這我可以拿一件有趣味的遺傳的事實做佐證。少年何以富冒險性，中年何以愛美術，老年何以講慈善，都是由於生理的組織所必然決定的。在身體發育健全的人，從二十一歲到三十歲是特別富有進取敢爲之氣的；從三十一歲到四十歲是特別愛好美術的；從四十一歲到五十歲是對各種實際的業務有特殊興趣而容易走上實用一途的；至在五十一歲以上，則對一切問題皆以冷靜之眼觀之，而留心所謂道德、哲學、宗教、慈善之類。這都是由於生理的組織是這樣決定的。於是從二十一歲到三十歲所生的小孩，大半是些英雄偉人，如亞力山大、拿破崙、弗力德烈等皆是。從三十一歲到四十歲所生的小孩，大半是些藝術家、文學家、音樂家，如哥德、席勒、拉飛耳、貝多芬等皆是。從四十一歲到五十歲所生的小孩，大半是些政治家，如畢士馬克、克倫威爾、彼得大帝諸人皆是。至五十歲以上所生的小孩，則大半是些哲學家、宗教家、道德家、慈善家，如佛陀、孔子、摩西、蘇羅門、亞里斯多德等皆是。由上面所述的小小的事實，我們可以知

道人類傾向物質和精神，都決定於生理的組織。西洋人身體強健，所以常傾向物質而成為新興之國；中國人身體衰弱，所以常傾向精神而成為老大之國。西洋的老年人多富有青年性，而中國的青年人卻多富有老年性，試問在這種乖戾的狀況之下，中國還有甚麼生機？也許可以這樣的解嘲：中國所以積弱，是中國人所得的營養物太不充足之故。

四

現代又是一個由漸變進到突變的時代。近百年的科學界、哲學界，莫不超過以往三千餘年的成績。尤其是科學方面，幾乎沒有不是在最近百年內所開的新紀錄，因以產生最近之物質文明。在過去悠久的二千餘年之間，無論在思想方面、生活方面，所發生的變化，只是極遲緩極微小的變化，或竟可以說無變化；但到了近百年之內，情形便完全不同了。單由工業革命所發生的變化，已足說明變化的全部而有餘。好像一個畸形兒永久不會生長，但一經生長，即高過成人而有餘。我們處在突變的現代，一切生活樣法亦遂不得

不因之而突變，否則不僅不能適應，抑且發生絕大的危險。譬如站在車馬充塞的十字街頭，如果不急起狂奔，便立刻有性命之懼。這種突變是使現代人生活緊張之唯一要因，亦即現代之所以偉大之主要元子。人生之意義與價值，在生活緊張的現代，俱不得不因之而重新估定。其他道德的標準，藝術的情趣，亦視此而發生絕大的區別。

現代既已走入突變之途，於是思想界爭爲變化之說明，或由變化進而爲奮鬥向上之說明。前者如柏格森的綿延說，後者如尼采的權力意志說。然而他們的說明俱不足以盡事實之真相，因爲他們只看重主觀的條件，不免遺忘了一大部分的客觀的條件。現代之所以突變與夫所以應付這突變之局，主在於客觀的條件之認清，徒然作主觀的論調，這於全盤問題之解決是不濟事的。譬如提倡道德學說者以爲現代人心不古，非從道德方面設法拯救，不足以應付現代突變之局；於是提倡各種道德上的新說，或主生命表現，或主自我實現，或主純粹意志，或主人格價值，以求拯救人類墮落於萬一。他們的用心未必不善，然而事實上毫無補益，因爲這些都只是頭痛醫頭，脚痛醫脚的方法，於根本問題

完全沒有接觸到。因為他們根本沒有認清客觀的條件，所以能任意的發明許多新說。這種「道德救國論」「人格救國論」亦祇足供文人哲人的欣賞，事實上是不會發生效力的。

應付現代的突變之局，非從客觀的條件上加以嚴密的考察、真切的探究，是不容易得到正當的結論的。不僅如此，我們的着眼點不應只及於一部而遺其全部。從全部謀解決，比專從道德方面謀拯救，或專從藝術方面謀改造者更有效而切實。這點留到將來有機會時再談。

五

上面已經說明現代之三種特徵，第一種特徵是由理想到現實，第二種特徵是由精神到物質，第三種特徵是由漸變到突變。這三種特徵都互相關聯，因以形成現代之偉大性。我們處在這個時代，應該如何接受這種偉大性，以確定個人之立場，以決定個人之使

命，這是當前的要着。我們不產生於十三四世紀之文藝復興時期，不產生於十五六世紀之宗教改革時期，不產生於十七八世紀之英法革命時期，而產生於現代，這非握住現代的核⼼，認明一己的責任，實不足以當「現代人」之目。時代是進化的，個人亦是進化的，時代向前，而個人落後，是謂時代的落伍者。自非甘心下向之人，誰願入此行伍。

我們處在劇烈緊張的現代，個人的責任非常重大，因此生活不得不求嚴肅。尼采說道：「人類吊在深淵上面的一條繩子，爬過去也危險，爬不過去也危險；看着也危險，戰慄停留着也危險。」又說：「人類的偉大，就因為他是一座橋梁，不是一座目標；人類的可愛，就因為他是一個過渡和一個沒落。」尼采這段教理，具有何等偉大的魄力。我們應覺悟，現在決不是個人享樂的時期，我們應以白熱的情懷、赤誠的心坎對待人類，這樣，方是現代人應有的懷抱，亦是現代人應盡的天職。

新時代與青年

月祺

有如人體的發育依賴新鮮的有生命的細胞，時代的進展依賴活潑有爲的青年。

誰都承認，爲感應新的狀況起見的社會改革與政治改革的要求一到了活動的時期，青年是脫不了干係的，不但脫不了干係，而且他們還獻身在隊伍的前列。無論在東方或在西方，各種改革運動——不論運動的傾向如何——的前鋒隊都是由最年輕的分子充當的。

這現象在各國間也許有進步的程度的差異，但沒有這現象的國家幾乎可以說沒有。這現象是非常緩慢地逐漸逐漸起來的，所以牠對於未來的重要性常爲人們所忽視。要是我們試把現代青年的氣質和他們的前輩的氣質作一番比較的觀察，我們就不難完全認知這新勢力的意義了。

青年運動的種種表現，各不相同，但不論在何國，牠們總與本國中最尖銳的問題有密切的關係；這是不容否認的舉世一致的情形。對於各國青年運動很詳知而且常和各國青年運動的領袖們接觸的一個美國新聞記者湯姆孫氏（Valentine Thomson）曾在紐約時報發表一段概括地比較各國青年運動的文字。他的觀察雖未必完全準確，但我們卻不妨把牠引述當作參考的資料。他說：

「目前，最尚武的和最革命的青年是在中國，印度，南美與中美諸國。組織最好的是在中歐諸國，特別是在德國。在那兩個自大戰以後激烈地改變了他們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國家——俄國和意國——青年處在爲使新制度鞏固起見的鬭爭的前鋒。

「在那些個人主義最發達的國家，也就是號稱最興盛的國家——法國，英國和美國——青年在組織方面和意志方面都最薄弱。但這也只是比較的情形而已。就是在這些國家，要是我們把運動的生氣和牠開始活動的期間的短暫作對比，我

們就清楚地明白，青年對於超個人以上的種種問題的覺醒是以非常的速度前進的。」

教育與革命常同時並進。自從西洋教育輸入我們中國，我們從前如睡獅一般的文化的基礎就開始動搖。由專制而共和，由共和而黨治，這其間不知多少青年學子喪失了他們的生命；在以後的革新中，更將有不知多少青年學子準備着喪失他們的生命。在日本，公然謀害首相襲擊官署以求達到他們的志願的乃是軍事學校的學生。在印度，對於英國統治下的武備的攻擊全出於高等學校的男女學生；出於成人們的，多少不脫甘地的無抵抗主義的方式。在南美，每一次民衆運動都以驍勇的青年學生作前驅。

在歐洲諸國，青年運動的興起大都是受舊式的「沙果耳主義」(Fokolsism)的感應。「沙果耳主義」距今六十年前起源於屬於捷克斯拉夫族的波希米亞。那時候，波希米亞民族正呻吟於嚴重的壓迫之下，但在那時候，捷克的國家主義卻不能用政治的形

式公開表現。於是，希求保存國家的生機，希求建設國家的文化，希求到達解放的時機，這種種熱烈的欲望終於在一種名叫「沙果耳」的青年組織的形式中表現出來。

從表面看來，「沙果耳」是一種專門屬於體育訓練的組織。但牠的創設者卻早已認知，對於健康，體力和自恃等興味的復興足以謀民族自覺的統一和鞏固。果然，「沙果耳」到了後來成爲具有堅定的革命精神的人物的中心；幾乎全部的捷克斯拉夫青年都加入了這個組織。捷克斯拉夫民族的解放得力於這個青年團體，是不容否認的事實。

「沙果耳」思想不久如傳染病一般蔓延到波蘭。波蘭的人民正掙扎着在三重統治之下求全國一致的國家主義的表現。波蘭的國家主義存在於嚴重的壓迫之下。波蘭人民的解放，波蘭青年運動的擴展，得力於「沙果耳」思想的影響着實不小。

這是值得注意的，「沙果耳」從開端就具備晚近在許多國家中爲感應新的狀況而起的種種青年運動所有的特徵。

他們表示青年對於機會不均等的制度的叛逆；他們放棄個人主義而趨於組織的